

走过 60 年 城乡巨变

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

□城镇化率达到 45.68%，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 5 倍多
□城市达到 655 个，建制镇 19234 个，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

本报电（记者赵永平、陈仁泽）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一座座工厂鳞次栉比，一条条公路宽广通达……新中国成立 60 年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，城乡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到 2008 年底，我国城镇人口 6.07 亿人，城市化水平由 1949 年的 7.3% 提高到 2008 年的 45.68%，提高了 5 倍多；城市个数由新中国成立前的 132 个增加到 2008 年的 655 个。与此同时，小城镇蓬勃发展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，城市发展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，城乡社会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、生活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。

“城市长大了，城镇变多了，竞争力强了。”人们这样感慨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大城市还寥寥无几，到 2008 年，人口 100 万以上城市达 122 个，50 万—100 万人口城市达 118 个。与此同时，小城镇快速发展，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

制，聚集效应显现。2008 年底全国共有建制镇 19234 个，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20% 上升到 45% 以上。城市群的崛起，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极。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三大城市群，用不足 3% 的国土面积，聚集了中国 14% 的人口，创造了 42% 的国内生产总值。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、中小城市为骨干、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。

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，带动区域经济持续发展。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增速迅猛，城市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；一大批跨国企业集团落户城市，商业连锁店、百货超市等涌现大街小巷，极大促进了城乡市场的繁荣兴旺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实现了连续 5 年 14% 左右的速度递增。截至 2008 年底，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总数达到 20.15 万个，带动农户 9808 万户。

“住楼房、挣工资、交保险，咱农民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”山西朔州平鲁区农民刘德说。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，越来越多的农民“洗脚进城”。加快城镇化发展，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、管理理念、行为方式在发生变化，深圳建立起农民工社保体系，有的地方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工资，有的城市打破城乡维权壁垒，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范围……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，让农民就业由亦工亦农转向全职非农，由城乡流动逐步趋于稳定。据统计，2008 年全国非农就业的农民工总量超过 2.2 亿，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8%，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 52%，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。

60 年城镇化发展，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公共设施从无到有、由弱到强，城镇功能日趋完善，承载能力逐步提高。昔日是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，现

在路网纵横交错，交通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，到 2008 年底，全国公路总里程已达 373 万公里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46 倍，全国 97.8% 的行政村通公路。人均生活用水量从 38 升提高到 178 升，用水普及率从 42% 上升到 95%，64.7% 的农村通了自来水。全国共 230 多个城市设置了公交优先车道或专用车道，搭公交、坐地铁，逐渐成为大多数城市居民出行的优先选择。

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增长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、生活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。抽样调查显示，2008 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 15781 元，比 1949 年增长 157.8 倍。过去住的大杂院、亭子间、土坯房、茅草房，如今变成了单元楼、公寓房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昔日梦想走进千家万户。到 2011 年，我国将基本解决现有 1000 万住房困难的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。覆盖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。



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图为安徽芜湖一家服装厂里农民工下班后走出车间。 吴 芳摄（人民图片）

身边 60 年

龙港镇创业者陈智慧——

农民自己造了个城

本报记者 顾 春

农民陈智慧，是第一批来到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的创业者，她还记得很多故事。

1984 年，第一任镇委书记陈定模来到龙港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“土地有偿使用”设想：谁愿意拿出 3 万元，就可以进龙港建房，有龙港镇户口。

“我老家在陈家堡，陈定模是我的

堂叔，他动员我们都去龙港发展。当时农民最大的渴望就是进城，有城市户口！1985 年我来到龙港。”陈智慧刚到龙港时，那里是个路不通、灯不明的小渔村，到处是荒滩和矮房。她买下地基，又花了 2 万多元盖了个五层楼。

当时许多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入龙港，到镇政府一个简陋的“欢迎农民进

城办公室”办落户手续，每天都有新建楼、新开路……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运动开始了。不到 3 年时间，已经有周边 3 万多农民来到龙港。“到 1992 年左右，学校、医院都有了，我们都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。”

进城后干什么？陈智慧说：“刚来龙港，大家都为生活发愁。能出去的在外跑业务，不跑业务的就在家办厂，发展经济都靠自己。”陈智慧现在已经是温州华泰印业有限公司董事长。她说：“今天的龙港，高楼大厦到处都是，外地客商云集，已是一个集聚 28 万人口、GDP 近 90 亿元的特大型城镇。农民自己造了个城，真的了不起！”

姚德清说，进入新世纪，浦东景象日新月异。如今，我们花木社区就像个“小联合国”。紧邻世纪公园的联洋社区，是上海闻名的国际社区，住在里面的老外可真不少。整个花木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达两万多人。与他们比邻而居的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上海人，来自浦西老城区的“城里人”，以及祖辈在这里务农的“新居民”。上海现在讲“海纳百川”，以前的蓝印户口、暂住证都取消了，2000 年推出了有“上海绿卡”之称的《居住证》，持证者的各项待遇向本市居民靠拢。今年，又公布了户籍新政，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者有可能转户籍了。地域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了。

家政钟点工，甚至还承包过小公司的厨房……一种漂泊的感觉挥之不去。2004 年的一天，在南岭汽车销售公司干了半年多，公司人事都通知她去签劳动合同。曹小萍开心极了，有了这份合同，她再也不是一句话就能打发走的打工妹了。

20 多年的漂泊，有时她不免会想起，老了后怎么办，一家人怎么办？直到有一天，公司人事部又通知她，按国家政策要求，公司为所有的员工买了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，只要他们累计缴够 15 年参保费用，今后就可在广州领取养老金。这让她第一次对一个城市有了亲切感和归宿感，她感到在这里有了未来。

感言

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发展

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李 铁

经过 60 年的风风雨雨，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，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。新中国成立初到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，是城镇化发展的自然增长期。改革开放至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，是城镇化进程的恢复增长期。21 世纪以来，我国城镇化进程步入了高速增长期。从统计数字上的变化看，从 1997 年到现在，我国城镇化水平每年至少增长一个百分点。到 2008 年为止，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了 45.7%，城镇人口已经达到 6 亿人。如果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，到 2020 年，我国的城镇化率将接近 60%，十六大提出的城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将基本实现。

党的十七大指出，要按照统筹城乡、布局合理、节约土地、功能完善、以大带小的原则，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。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，以特大城市为依托，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。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：

一是城镇化发展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，“减少农民，才能富裕农民”，有利于增加农村的人均占有耕地资源，增加非农就业机会，提高农民收入，也有利于增加农产品的商品消费需求，丰富农产品的品种结构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，更有利于通过人均占有耕地资源的增加，吸引现代要素投入到农业领域，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。

二是加快城镇化发展，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定居，有利于拉动国内需求，带动 GDP 增长。按照每年城镇化率增长一个百分点计算，每年我国将有 2000 万左右的人口从农村到城镇定居，也意味着每年将有至少 600 万个家庭进入城镇。如果他们转为城镇人口，在城镇购房、消费，将会对房地产业、工业制成品等产生巨大的需求。

三是推进城镇化进程，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，将大大增加城镇的活力，提高城镇的竞争力。农村年富力强的就业人口进入城镇定居，将改变城镇的人口结构，增加城镇的劳动力供给，特别是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关键时期，缓解城镇老年人口的供养压力。农村人口进入城镇，还将大大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，减轻未来可能出现的教育资源严重过剩的压力。

但是，我国城镇化发展任务十分艰巨，还面临着很大的制度障碍。例如，虽然统计上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 45.7%，但实际上其中绝大部分并没有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。而在我国统计为城镇人口 of 居民中，仍有 1.6 亿人是长期在城镇就业务工的外来农村人口，他们的长期消费趋势在农村。虽然我们城镇化率逐年提高，但真正转变这些进城农民的身份，破解有关制度性的障碍，还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。

上海户籍警姚德清——

浦东成了“小联合国”

本报记者 孙小静

“1986 年，我从部队复员回来，就当上了户籍警，至今已经整整 23 年了，变化翻天覆地。”上海市花木派出所社区民警姚德清开门见山。刚上班那会儿，这里就是农村，每个月姚德清有 20 天要下到村里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身泥。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，一切好像进

广东外来妹曹小萍——

打工 20 年当上新市民

本报记者 李 刚

“南下打工 20 多年，现在觉得安定下来了，当上了城里的新市民。”广州南岭汽车销售公司清洗车间主管的曹小萍说。

1987 年冬天，曹小萍从老家湖南安乡县下渔口镇，随姐妹们挤上了南下的列车，到了广东，成了一个纺织女工。几



共和国部长访谈录

【提要】

60 年来，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，金融业实力大增，服务百姓能力全面提升，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



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周小川

让中国经济血脉畅通

——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

本报记者 田俊荣

这似乎不是央行行长而是一位教授的办公室。

桌上摆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·科尔奈的新著《思想的力量》，还有一篇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。案头的名片，没有“中国人民银行行长”的头衔，只有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、中国科学院商学院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

兼职教授”的字样。这就是周小川，一位专家型的央行行长。他出身清华博士，在学术研究上造诣颇深，曾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——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。“无论是制订货币政策还是维护金融稳定，都要通过研究分析来提前作出判断，这样才有前瞻性、预见性。”周小川微笑着说。

“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”

在今天的中国经济舞台上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精彩登场，其一招一式都惹人关注。

“去年 9 月以来，央行先后五次降息，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。今年以来，货币信贷增长较快，对促使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周小川说。

周小川也毫不讳言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正面临挑战：

——每种货币政策工具都有优点和不足，如何选择适当的工具需要斟酌。

——货币政策有时滞。“有的政策 3 个月后才能看到效果，有的要 6 个月甚至一年，你只能用预测的结果来指导现在，为此需要许多历史数据来作推算。然而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很难有历史数据供你参考。”

——“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，要高度重视其传导机制”，周小川解释说，“货币政策在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，在一个时期和另一个时期，传导有效性是不一样的。你看西方一些国家，它的货币政策力度并不小，但银行借贷，结果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传导下去，或者是传导下去却打了很大折扣。”

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。60 年来，特别是

改革开放 30 年来，金融充分发挥现代经济的核心作用，努力让中国经济“血脉畅通”。

“不能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毛了！”周小川的这句名言，道出了央行的重要职责是保持币值稳定。“币值稳定不是说一点都不动。一般来说，发达国家往往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在 2% 左右，也就是每年物价上行不超过 2% 左右，那么利率也应该高于 2%，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国情，通胀目标一般会比发达国家定得稍微高一点。”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人民银行出台运用货币政策，成功治理多次通胀，力保币值稳定，为助推经济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人民银行大力收紧银根，举办折实存款，配合财政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，不到半年就有效抑制了此前长达 12 年之久的通货膨胀。1955 年 3 月，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，规定旧币 1 万元兑换新币 1 元，最后消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通胀痕迹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央行先后四次执行了以反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，分别发生在 1985 年前后、1988—1989 年、1993—1995 年和 2003—2008 年，都取得了较好效果。

“金融业改革之路还很漫长，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”

60 年只是弹指一挥间，而中国金融业却获得了“几何级数”的增长。改革开放前，我国金融资产总量仅 3000 多亿元；30 年后，金融资产总量已达 86.5 万亿元，比 20 年前的 1989 年足足增长了 53 倍。

“巨变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”，周小川说。他亲身参与了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改革。

“2002 年，境外媒体对中国金融业有很多批评。有人说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个大定时炸弹，也有人说，中国的金融体系技术上已经破产。那时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 25%，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，实际可能 25% 都打不住”。周小川回忆道。

改革已是箭在弦上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果断决定，实施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。2004 年 1 月，国务院公布中行和建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试点点的决定，这项被温家宝总理称为“背水一战”的改革正式拉开大幕。

“改革改善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，明显提升了其实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使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经受了考验”，周小川打比方说，“相当于在危机前就建好了‘缓冲垫’，这样一来，好比一辆汽车遇到很大的颠簸，但由于缓冲设备还不错，所

以没有把人给颠出去。”

时下，工行、建行、中行已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。对此，周小川表现得很冷静：“银行排名有好多种标准，市值是一种，此外还有营业额、总资产、核心资本等，即使市值也是动态变化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还很漫长。中国金融业尤其要特别强调与时俱进，强调有风险意识，什么时候都不能自满。”

由于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，周小川被媒体尊称为“人民币先生”。

谈起这次改革的背景，周小川说，我们的汇率体制改革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，进入 90 年代以后有几次重大改革：1994 年 1 月 1 日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，4 月成立了外汇市场，1996 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。正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，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汇率改革了，而机构还不健康，就会造成风险。于是，风暴过后，2003 年 10 月，国务院确定了先进行国有银行改革，同时逐步放宽外汇管制，推进外汇市场建设，然后再进行汇率改革的顺序。“所以，这次改革不是迫于某种国际压力，而是我国从自身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”。

“推动金融服务‘飞入寻常百姓家’”

“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央行推动金融服务‘飞入寻常百姓家’，金融与大众联系越来越紧密。”周小川说。

如今，人们的钱包里都会有几张银行卡。一张卡片，一个签名就能轻松完成一笔消费。在央行和相关部門的共同努力下，银行卡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。全国总发卡量达 19 亿张，居全球第一位；剔除房地产、大宗批发等，银行卡消费金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 27.7%。

刚从欧洲旅游归来的谷先生，回国

第一件事，就是在自己的国际信用卡上存钱，还掉境外消费的 1000 欧元。“逾期不还会被记入‘信用档案’，信用上有了污点，以后想贷款、办卡什么的可就难啦！”

让谷先生珍惜的“信用档案”由央行组织建立。2006 年 1 月，个人“信用档案”——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，目前已收录近 6.54 亿人的信用信息。个人“信用档案”好比“经济身份证”，通过褒奖守信行为、惩戒失信做法，来激励和约束个人重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，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水平。

“不对的说法一定要顶回去”

今年 3 月，在 G20 伦敦峰会召开前一周，央行网站上连续刊载了周小川的三篇文章，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。

“今年年初曾有一种观点，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储蓄太多导致全球不平衡。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，一定要顶

回去！”周小川说。

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，以及中国在危机救助、恢复经济增长、维护金融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中国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也不断提高。中国的金融立场和政策主张正越来越为世界所关注。